

并非自由的强盗

村上春树《袭击面包店》及其续篇的哲学解读

杨永良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SHAN 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并非自由的强盗

村上春树《袭击面包店》及其续篇的哲学解读

杨永良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SHAN 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并非自由的强盗:村上春树《袭击面包店》及其续篇的哲学解读/杨永良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209-05397-6

I. ①并… II. ①杨… III. ①村上春树—小说—文学研究
IV. ①I313.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3917 号

责任编辑:陈丹丹

装帧设计:彭 路

并非自由的强盗

——村上春树《袭击面包店》及其续篇的哲学解读

杨永良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165mm×230mm)

印 张 9.7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5397-6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电话:(0539)2925659

引 言

——

这看起来是两个十分荒唐、荒谬、荒诞的故事。

肚子饿了,想到吃饭,没有钱买,又不想工作并以其劳动所得解决肚子饿的问题,于是两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就去面包店抢劫。他们手持菜刀,气势汹汹地闯进他们熟悉的面包店,但他们没有动武,也没有施暴,而是通过和面包店老板一系列莫名其妙的谈判,通过不可思议的“交易”,成功地、名正言顺地拿到了面包,解决了肚子饿的问题。这便是村上春树在其《袭击面包店》中所描述的故事。10年后^①,两个小伙子中的一个早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有了收入,并已结婚成家。但新婚不久,便因与其妻子一起又一次被难忍的空腹感所困扰,从而计划再次抢劫面包店。不过,这一次他们不是没有钱买,而是特意去实践名副其实的抢劫面包店的行为。但在东京深夜的大街上,他们没有找到正在营业的面包店,只好违心地抢了麦当劳店。他们又一

^①《袭击面包店》最初发表于《早稻田文学》1981年10月号,《再袭面包店》最初发表于《玛丽佳尔》1985年8月号,其间相距不到4年。但据《再袭面包店》的主人公回忆,《袭击面包店》所述故事的发生大约是“十年以前的事了”,据此可知,按作者设计,《再袭面包店》所述主人公的抢劫行动是在《袭击面包店》所述故事发生10年后进行的。本书在述及故事内容和实际创作情况时,分别以10年和近4年表述其时间间隔。

次获得了成功,通过名副其实的、不折不扣的抢劫行为,用抢来的汉堡包解决了肚子饿的问题。这便是同一作者所描绘的被称为《再袭面包店》的故事。

在号称法制教育普及、法制体系完备的现代日本,在被认为是西方世界最安全的东京,在《袭击面包店》的故事中正在大学法学专业学习,在《再袭面包店》的故事中已经在法律事务所工作的主人公竟然为了几片面包而铤而走险,以身试法,这看起来子虚乌有、匪夷所思,令人难以置信。面对既不曲折、复杂,又不合情理的抢劫故事,人们完全可以用荒唐、荒谬、荒诞之类字眼对其进行评价和总结。

然而,这看似荒唐、荒谬、荒诞的故事似乎又蕴含着许多极为深刻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需要我们探讨。

无论是将《袭击面包店》和《再袭面包店》(以下在本书中需将这两篇小说并举时,简称《两袭》)作为两篇各自独立的作品,还是将《两袭》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欣赏和认识,我们都不难发现,《两袭》所描述的两次抢劫事件,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故事性。无论是《袭击面包店》,还是《再袭面包店》,都没有多么复杂的故事情节,也没有多么曲折的故事内容,借用《袭击面包店》主人公的话来说,实际上倒是现实生活中电视画面上的抢劫案件,要远比《两袭》更引人入胜,更耐人寻味,更能展现小说故事的娱乐功能。

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两袭》所描述的两次抢劫事件明显地不合常情,于理不通。无论是《袭击面包店》,还是《再袭面包店》,其主人公都将其抢劫的标的限定为可以充饥的面包(或汉堡包),但在和平年代的正常情况下,仅仅用来充饥的面包,显然不值得主人公们手持凶器,气势汹汹、煞有其事地进行抢劫。这正像《再袭面包店》主人公的妻子所说,在经济发达的现代日本,“只要稍稍打点工,买面包之

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作为小说,《两袭》所描绘的抢劫案件与其故事性的这种明显的背离;作为抢劫案件,性质极端恶劣的持械抢劫和近乎唾手可得的抢劫目标之间的这种显而易见的不对称,这些都似乎隐约地透漏出些许信息,说明小说作者并无意通过《两袭》描述两个有关抢劫的故事,而是希望通过《两袭》审视两次以抢劫来表征的人类行动。

如果我们的这一推论可以成立,如果我们将《两袭》所描述的故事抽象为以抢劫来表征的人类行动,我们将不难发现,《袭击面包店》所诉说的是,作为近代人类行动者的主人公们在其意志和行动的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而《再袭面包店》所诉说的则是,作为现代人类行动者的主人公们在其意志和行动的方面均已丧失殆尽的情况下,所面临的充满焦虑、不安的危机性境况。

二

尽管《两袭》的主人公们都把他们抢劫的目标限定为填饱肚子的面包,但这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抢劫是一种犯罪行为,是一种罪恶行径,是一种针对整个社会秩序和统治体系的破坏行动这一事实和性质。不考虑以其劳动所得换取面包,而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以抢劫的方式来解决肚子饿的问题,这说明《两袭》的主人公们有一种甚至是不由自主地发动攻击的欲望,有一种近乎本能地进行破坏的冲动。不过,遗憾的是,虽然拥有进行破坏的欲望和进行攻击的冲动,但他们却既没有明确的方向,更没有可视、可感的目标。并非非常时期的面包,显然大可不必持械抢劫,近乎疯狂的抢劫恶行和远非价值不菲的抢劫目标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不对称性。这说明充饥显然只是形式,面包和面包店充其量只不过是他们发

泄破坏性、攻击性冲动的某种象征。

这使我们不由得想起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不由得想起他的《单向度的人》,因为正是他曾经在该书中尖锐地指出:“显而易见的剥削根源,消失在客观合理性的外表后面”,“仇恨和挫伤对方的意图被剥夺了特定的目标”。^① 只有进行破坏的攻击性冲动和欲望,却没有也找不到其“特定的目标”,这或许正是《两袭》的主人公们毫不犹豫地选择抢劫,选择以抢劫来满足自己对于面包的需求的深层原因之所在。而这都是因为“在20世纪,社会的统治和控制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直接地、简单地表现为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政治、经济、国家、行政组织、意识形态等也不再以相对独立的领域或社会力量而存在,而是整合成一种消解人之主体性和人的自由的异化的文化力量”^②,都是由于“新的技术工作,世界因而强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否定地位:工人阶级似乎不再与已确立的社会相矛盾。这一趋势同时又在另一方面即管理和指导方面为生产技术组织的作用所加强。统治转化为管理。有资本的老板和厂主正在丧失他们作为负责人的身份;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机器中正起着官僚的作用。理事会和董事会远远超出了个别企业而扩展到科学实验室和研究院”^③。正如本书第四章第一节所述,《两袭》的主人公们貌似自由的抢劫意志和抢劫行动,实际上却远非自由,也正像他们远非自由的意志和行动使他们远离其真实的自我一样,正是由于“技术的面纱掩盖了不平等和奴役的再生产”,由于“以技术的进步作为手段,人附属于机器这种意义上的

①③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②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5页。

不自由,在多种自由的舒适生活中得到了巩固和加强”,由于“这种不合理事业中的压倒一切的合理性”^①,而导致了“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②的异化状况的加剧,更导致了异化的普遍化,使异化渗透到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三

这些都是从德国精神病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艾里克·弗洛姆所谓现代人的“个人化”开始的。按照弗洛姆的说法,西方社会的现代人产生于中世纪之后,以中世纪以前的生活方式生存的传统人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而生成为现代人。而现代人则以理性、个性、自由为其发展的内涵,其本质就是人的个体化。这正如弗洛姆所说:

当人类从与自然界同一的状态中觉醒过来,发现他是一个与周遭大自然及人们分离的个体时,人类社会史于是开始了。然而,在历史的漫长时间中,这种觉醒一直是隐晦不显的。个人仍继续与大自然及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他已部分地发觉,他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但是他还依然觉得,他是周遭世界的一部分。这种个人日渐脱离原始关系的“脱颖”过程——我们可称此过程为“个人化”——在宗教改革到目前这数百年当代历史中,已达到其顶峰状态。^③

但是,正如日本近代著名小说家夏目漱石早在1906年便强调指出的,个体化了的现代人“由于汽船、火车、权利、义务、道德、礼仪而

①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7~28页。

②弗朗索瓦·佩鲁:《和平共处》,转引自马尔库塞上引书,第28页。

③弗洛姆:《逃避自由》,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疲惫不堪”^①一样,在弗洛姆看来,由于现代人脱离了传统人所赖以生存的天人合一、物我不分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由于他们成为“孤独的个人”,因此,在现代西方社会,他们虽然“获得了积极的自由。但是,同时他也脱离了以前给予他安全感及相与感的那些关系”,“他对自己和对生活的目的感到怀疑。他遭到威力庞大的超人力量,资本及市场的威胁。由于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潜在的竞争者,人与他人的关系变成敌对的和疏远的;他自由了,但这就表示,他是孤独的、隔离的,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同时,由于现代人“失去与人及宇宙的同一感,于是,一种他个人无价值和无可救药的感觉压倒了他。天堂永远地失去了,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个世界——像一个陌生人投入一个无边际而危险的世界。新的自由带来不安、无权力、怀疑、孤独及焦虑的感觉”^②。因此,使传统人和现代人形成鲜明对照的便是,传统人安全但不自由,现代人虽然自由但却既孤独又没有安全感。

然而,实际上,西方社会的现代人不但既孤独又不安全,甚至其所谓的自由也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形式上的,是马尔库塞所指出的那种“在多种自由的舒适生活中得到了巩固和加强”的“不自由”。

焦虑、孤独、不安、无权利和以自由的形式所掩盖着的实质上的不自由,普遍的异化、个人化和非人格化的、没有具体的可视形态的统治力量,正是这些使西方社会的现代人形成了其不同于传统人的压抑性心理机制。这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由于降低爱欲能力而加强性欲能力,技术社会限制着升华的领域。同时它也降低了对升华的需要”,“既然更为充分的自由导致的是本能需要的克制而不是扩张和

①夏目漱石:《草枕》,见夏目漱石:《少爷·草枕·外一篇》,(日本)旺文社,1968年,第162页。

②弗洛姆:《逃避自由》,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5~36页。

发展,那么它的作用就有利于普遍压抑的现状而不是相反——人们不妨谈论‘制度化的俗化’。后者看来在造成我们时代的专横个性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因素”^①。正是以“劳动(工作)异化为苦役;爱欲降格为单纯的性欲”为其表征,以压抑性为其本质的现代人的心理机制的形成,使得西方社会的“现代人往往‘自由地’经受压抑,把压抑视作自己正常的生活”^②。

四

超越自然,脱离原始关系的“脱颖”和“个人化”,虽然使人们取得了至少是表面上的自由,但却夺去了人们在与自然保持原始关系时所拥有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多种自由的舒适生活”所掩盖着的是“不自由”,是焦虑、孤独和“无权力的感觉”,正是这些使人们生活“在‘普遍压抑的现状’中,形成了将压抑视为正常的压抑性心理机制。面对因为自由而不期而至的焦虑、孤独、不安和沉重的责任,“当一个人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时,他便觉得孑然孤立而面对着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他“便产生了想要放弃其个人独立的冲动,想要把自己完全隐没在外界中,藉以克服孤独及无权力的感觉”^③。“如果人类个人化过程所依赖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环境(条件),不能作为实现个人化的基础,而同时人们又已失去了给予他们安全的那些关系(束缚),那么这种脱节的现象将使得自由成为一项不能忍受的负担。于是自由就变成和怀疑相同的东西,也表示一种没有意义和方向的生活。这时,

①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60页。

②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5页。

③弗洛姆:《逃避自由》,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6~7页。

便产生了有力的倾向,想要逃避这种自由。”^①于是,现代人便开始了其“逃避自由”的进程。

西方社会的现代人对于自由的逃避,表现为多种形式和方式,其中之一便是破坏性或攻击性的逃避机制。按照弗洛姆的说法,所谓“破坏的冲动”是“一种深藏人心中,时刻在等待机会,予以发泄的癖性”,“是人们内心中的一种强烈情感”,它“常常需要找到某种对象,来发泄之”。^②这种“破坏的冲动”的目的“不在于主动的或被动的共生,而在于想消灭它的目的物。可是,它也是产生于个人无法忍受的无权力感及孤独感。由于我把外在的东西摧毁了,因为,我可以免除了我自己无权力的感觉。当然,如果我成功地消灭了外在的目的物,我还是孤独的和孤立的,可是,我这种孤独是一种绝佳的孤立状态,在这种孤立状态中,外在的目的物之力量,不能再压服我了。毁灭世界是想使自己不再受外界力量摧毁的最后一种,几乎是奋不顾身的企图”^③。可见,攻击和破坏虽然看起来极端、偏颇,但其实质却只不过是摧毁一切外在威胁,来缓解其自身内在的“个人无法忍受的无权力感及孤独感”的手段而已。

不过,破坏性或攻击性的逃避机制毕竟是“逃避自由”的极端的形式,现代人更多的或者说更基本的“逃避自由”的途径则是对于某种权威的认同,也就是弗洛姆所说的“屈服于某人的权威下,或与他人及世界建立某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依靠某种权威的庇护,依靠某种关系的保证,借助对于权威和关系的认同而产生的一体感,人们便可以安然自得,便可以从因为自由而导致的孤独和不安中解脱出

①弗洛姆:《逃避自由》,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第13页。

②同上,第108页。

③同上,第107~108页。

来。然而,这种解脱的代价也是高昂而沉重的,这是因为“这种屈服或关系会剥夺了他的自由”^①,而这种自由却是来之不易的,是通过几代人几百年前赴后继的斗争,并付出了包括无数仁人志士的生命在内的极大的牺牲才得来的。

五

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述,尽管《两袭》所叙说的故事描述的都是以抢劫为表征的人类行动,两个独立的故事在其内容上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作为两篇各自独立的作品,两者的主旨却是有所区别,甚至是大相径庭的。如本书第四章第一节所述,《袭击面包店》的主人公们是在拥有意志和行动这两方面的自由的情况下,走向邪恶而意欲抢劫面包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他们是有条件的“自主为恶”者。不过,当他们将其抢劫意志付诸行动时,他们的行动的自由却遇到了各种障碍和问题,这使他们的自由意志并未能完全落实为自由的、合理的行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袭击面包店》所描述的故事雄辩地证明,在现代西方社会,人们的自由只是表面上的,主人公们的抢劫行动充其量只是表达了一种破坏性冲动。借用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的话来说,他们意欲抢劫的破坏性、攻击性冲动,正是在这种因其已经渗透到各个生活领域从而普遍化了的、表面上的自由和实际上的不自由的张力和矛盾中,在由于这种张力和矛盾而形成的压抑性心理机制中产生的。其表征着破坏性、攻击性冲动的抢劫意愿,正是对于那种表面上的自由的质疑和否定,正是对于由“新的自由”所带来的“不安、无权力、怀疑、孤独及焦虑的感觉”的盲目地反抗和逃避。

^①弗洛姆:《逃避自由》,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第13页。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再袭面包店》的主人公们的抢劫是在其失去了自由意志,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失去了其真实的自我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之所以失去了这一切,是因为他们受到带有咒语性质的瓦格纳的音乐的操控,同时又受到以其所谓“总体性状况”为表征的物理(科学、因果)决定论所规定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不但他们的抢劫依然体现了其压抑性的心理机制,体现了其失去具体反抗目标的破坏性、攻击性冲动,同时,他们以其所谓“总体性状况”为表征的强硬的物理决定论立场,还表达了他们对于现代西方社会表面上的自由的逃避和反抗。不过,与破坏性、攻击性的抢劫相比,遁入强硬的物理决定论的他们,无疑正是完整地体现了弗洛姆所谓以“剥夺了他的自由”为条件,以“屈服于某人的权威下,或与他人及世界建立某种关系”的形式而表达的对于自由的逃避,体现了其对于因为自由而导致的孤独和不安的逃避。不过,应该注意的是,物理决定论既是一种权威,也是一种人与世界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再袭面包店》的主人公们在投入其怀抱之后,才能够心安理得地抛弃了其来之不易的自由,才能够安然自得地完成其对于自由的逃避行动。

如本书第四章第一、二节所述,本书作者认为《两袭》的主题思想就在于对西方社会自由传统的质疑和否定,就在于对丧失真正的自由,丧失真实的自我,丧失生活的意义的现状的不安和焦虑,就在于对自由和根据自由而形成的社会责任的逃避。不言而喻,马尔库塞和弗洛姆所论正是形成《两袭》这一主题思想的社会的原因之所在。

六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逃避——无论是以破坏和攻击的形式,还是

以归依于某种权威和关系的形式——虽然能够使人暂时摆脱压抑性心理并能使人得到暂时的心安理得,但却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最终解决。这是因为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还有人生活,还有人与人的关系存在,就不但会有善或恶的行动和观念,还会有逻辑思维、伦理道德,还会有对于生活意义的追求,还会有对于精神家园的寻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作者显然倾向于通过《再袭面包店》的强硬的物理决定论构建一种诉诸必然性的乌托邦图景,而这就是在其《海边的卡夫卡》第30章中出现的按照事物在因果关系和因果规律中的作用而“必然要存在的便是应当存在的”,而“不是必然存在的便不应当存在”的世界。^①借助日本江户时代著名小说家上田秋成关于金钱的精灵的构想(见其《雨月物语》中的《贫福论》),以象征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精髓的卡内尔·山德士的形象而现身的现代精灵,吸收已故美国现代社会学家E·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的拟剧论(Dramaturgy)和美国当代著名传播学家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的媒介情境理论而建立了这样一个应当等于必然,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合而为一的必然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只有客观事物“不论在什么情形之下,都是和物体完全不能分离的”固有属性得到认可,^②只有依据客观规律“使结果在原因之后出现”的客观必然性得以保留,^③而近代英国著名经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在其《人类理解论》中所说的“第二性的质”等“关系的观念”,即依据客观事物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根据人的需要等主观因素而形成的各种关系,根据这些关系而形成的客观事物的颜色、声音等事实关系属性和善恶、美丑

①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下),第128页。

②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00页。

③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下),第121页。

等价值关系属性均被排除在外。由于取消了客观事物的关系属性,取消了逻辑思维、伦理道德、人生意义等与主客关系有关的价值观念赖以形成的客观基础,因此,在这样一个必然王国里,便只能看到必然和必然性,而没有了声音、颜色、善恶、美丑等反映主客关系的现象和观念。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便不必再为自己的善恶美丑而焦虑,更不必为社会的善恶美丑而不安,因为这是一个只要按照因果规律完成自己在因果关系中的功能便可万事大吉,而“没有必要对人进行善恶评价”,更“没有必要按照善恶标准行动”的世界。^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总体性状况”所体现的《再袭面包店》的强硬的物理决定论还仅仅是一个过渡,而以因果规律为基本规律的必然王国则是在《海边的卡夫卡》中得以最后完成的。不过,对于村上春树笔下的主人公们来说,这样一个现代乌托邦式的必然王国是否就意味着是他们的家园和乐土,他们在那里是否就真的生活得安然自得,那或许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有所体验,而对于在现实世界中实实在在地生活着的我们来说,却肯定是因人而异,难有共识的。

本书所见日语文献引文,除特别注明出处者外,均由本书作者据本书所注明的文本译出。有关村上春树的小说作品,所据文本如下:

1.《袭击面包店》,见村上春树、丝井重里《愿在梦境中相见》,(日本)冬树社,1981年,第158~164页。(《袭击面包店》在刊载于村上春树与丝井重里合著的该文集时,曾一度名为《面包》,后于1986年改称《袭击面包店》,并已此名行世。在本书中统称《袭击面包店》。)

2.《再袭面包店》,见村上春树《再袭面包店》,(日本)文艺春秋,

①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下),第120页。

1996 年,第 11 ~ 35 页。

3.《挪威的森林》(上)、(下),(日本)讲谈社,2006 年。

4.《海边的卡夫卡》(上)、(下),(日本)新潮社,平成 18 年。

5.《且听风吟》,(日本)新潮社,2005 年。

其中,除《袭击面包店》和《再袭面包店》因篇幅短小不再另作说明外,引用其他作品时仅注上述各书页数。

目 录

引 言/1

第一章 《两袭》的创作与作者的意识内容/1

第二章 《两袭》“隐喻”浅释/19

第一节 “想象”与“虚无”

——《袭击面包店》与萨特的意向性意识理论/21

第二节 “肚子饿了”与“上帝死了”

——《袭击面包店》中的卡拉马佐夫论题/31

第三节 笼子找鸟与邪恶盛行

——《袭击面包店》中的自由与邪恶/43

第四节 “希特勒青年团似的感动”

——《袭击面包店》的“追求食物的意志”/67

第五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地狱”

——自由选择的痛苦和困境/78

第六节 面包选购与多数暴政

——《袭击面包店》的自由、平等和民主/91